

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

魏國祿 著



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

魏國祿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魏国禄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印张 2插页 60千字

197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09·603 定价 0.26 元



周 恩 来 同 志 遗 像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周恩来同志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是在陕北时留影。

目 次

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	1
严惩放火者	7
搓稻谷	11
在遵义	13
一个金戒指	17
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	20
扎西扩军	23
“饭撒了是小事”	26
在曲靖附近	30
十个鸡蛋	34
过泸定桥	37
高山露营	43
永远难忘的记忆	46
周副主席在病中	53
草地生活片断	59
过后河	67
继续深入草地	70

在一个党小组里	74
终生的感激	78
“不能违反政策”	81
分水岭打骑兵	84
我们胜利了	87
还可以穿一个冬天	92
送信	94
入学前后	106
附录：幸福的会见	111
后记	118

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

一九三三年秋天，我们党在江西红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会。运动会上有射击赛、田径赛和各类球赛等等，特别热闹。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保卫队工作，担任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首长作政治报告，讲的话句句深入人心。我深深敬佩这位首长，他知道的事情真多。可是他是谁呢？看来年纪并不很大，为什么留着那样长的胡子？后来向别的同志打听，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党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

一九三四年六月，我调到中央局工作不久，有一天，我们的李队长找我谈话，说要把我调到总部去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问：“到那里干什么工作？”

李队长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你到了那里就知道啦。”

当时我有些不高兴，心里想：你既然同我谈话，调动我的工作，怎么会不知道去干什么呢？既然知道，为什么又不告诉我呢？但是转念一想，也许是需要这样吧？在国家保卫局上保密课的时候，不是常讲“不需知者不求知，不应讲者不乱讲”吗？于是我拖音拉调地回答说：“好吧，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意见。”

李队长大概看出了我的情绪，笑了笑给我解释道：“不要不高兴嘛！事情决定得很急，我的确不知道调你到总部去干什么工作。”他停了停又说：“不过，我估计很可能是去给哪一位首长当警卫员。”

就这样，当天下午，我整理了一下简单的行装，带上介绍信到了总部。但是，我内心里一直嘀咕：跟哪位首长当警卫员呢？跟首长工作，要做些什么事呢？我能干得好吗？……总而言之，想的很多，也很具体，甚至将来用什么枪，是快机还是一般的匣子枪都想到了，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上午，总部的一位参谋对我简单地说：“调你到这里来跟周副主席当警卫员，我带你去见见首长。”

“周副主席？”一天一夜的闷葫芦解开了，我兴奋地用手比着自己的下巴，问那位参谋：“是不是胡子搭到这里的那位首长？”

他说：“是。怎么，你认识他？”

我带着一种挺骄傲的神气说：“认识，认识，去年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还听过他的报告呢。”

“你也是苏维埃代表？”参谋显出了惊奇的样子。

我赶忙向他解释：“不，不，我当时担任大会的警卫工作。”

他带我来到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这时首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仍和一年前我初次看到他的时候一样，所不同的是那身灰军衣已成了白的，显得更旧了。那位参谋向首长说明我是新调来的警卫员之后，又同周副主席谈起了别的事情。这时我拿眼扫了一下整个办公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江西式平房，收拾得相当干净。屋内陈设很简单，有几把椅子，两张桌子，一张上面摆着书报杂志，另一张是办公桌，上面一个笔筒里插了几支毛笔，还有一个很大的黄铜墨盒，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我心里想，我们的周副主席整天为革命事业操心劳累，辛辛苦苦，但他的生活处处都和群众一样，一点没有特殊。

这时带我来的参谋谈完事走了。他一走，不但打

断了我的思路，而且剩下我一个人在周副主席面前，倒觉得有些拘束了。只见周副主席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件，站起来，先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笑着问我：

“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说：“魏国禄。”

“是从哪个单位调来的呀？”周副主席说着走到了我的面前。

“从国家保卫局。”

“十几岁啦？”

“十八岁。”

“是党员还是团员？”

“是党员。”我虽然有些不好意思的这样回答了副主席，但内心里却有一种得意的感觉，心情也舒畅了，说完后抬头看着首长。

他满意的点了点头，笑着说：“很好，很好。”接着，周副主席把早已站在门口的另一个警卫员范金标同志叫进来，对他说：“工作问题，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分分工。没有事情的时候好好学习。去吧，带他看看住在哪里。”

我向首长敬了一个礼，就随范金标同志走出了办公室。

我到了副主席那里不久，他几乎天天出去开会。

白天开会，晚上也开会，不知哪里那样多的会，好象永远也开个没完。首长们开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会，到了九月中旬，我发现司令部各单位，每天晚上到了夜静更深的时候，就有人大批地焚烧文件，一夜，两夜，一连几夜地烧，烧个没完。凭当警卫员的经验，首长们开会与烧文件有关，而这两个现象又说明最近有可能要打仗或者有什么行动。但谁也没有透露关于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表面上看来，生活如常，没有什么变化。连总部机关自己种的大片蔬菜，也照常天天有人去浇水、施肥……。

但是，猜测终于被证实了。由于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十月初，周副主席把我和范金标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最近要出发，要走很远的路，让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作好准备，不必要的东西统统交回供给部。这一下可使我们为了难。副主席哪一样东西是不必要的呢？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办公室里那个大铜墨盒倒挺笨重，但那是副主席办公经常要用的呀，也减不得，最后只好在那些旧书报杂志上打主意。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十月十八日下午，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瑞金出发，向着雩都方向前进。从此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严惩放火者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长征的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居住区。

奇怪得很，自从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十几天以来，晚上经常有红军驻的地方着火，加上苗族弟兄的房子又都是草和木头盖起来的，所以，一烧一大片。火，成了我们当时很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不仅威胁着我们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也给我们红军带来一些影响，给苗族兄弟造成了重大损失。为了对付这些奇怪的火，部队和机关组织了许多人员做防火、救火工作，把人们精神上搞得很紧张。这些情况引起大家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对敌情进行调查。

有一天，我们在龙坪镇宿营。龙坪镇是一个不小的村镇，房子、街道都很整齐。在这个镇子上居住的都是僮族。

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是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

早的一个晚上。照顾首长吃饭、休息以后，我们也就很快休息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已很疲劳，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夜间十二点左右，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被哨兵的叫喊和“辟辟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火势漫延很快，团团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我这一惊非同小可，顺手抄起一条毯子就窜进了首长的房子。这时，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周副主席已经起床了，我不顾一切地领着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这间房子便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周副主席刚出来，马上就派我们去看望其他首长，并了解部队的情况。正在这个时候，其他几位首长急促地赶来，看样子他们也正在为副主席的安全着急。首长们到一块，立即研究失火的问题，要部队提高革命警惕性，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这时候，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救火的，有找人的，有搬东西的，有帮助老百姓从火中往外抢东西的……。不时还听到人们对于今晚失火问题的议论。

黑暗中不知是谁说：“是哪一个不小心，引起了这样一场大火？”

另一个人说：“我看这火很可能是敌人放的。”

这时周副主席走过来，叫去找作战参谋，告诉他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把没有事情的人员集合起来，待命行动，不要乱跑。

我从参谋同志那里回来以后，看到几位首长，还有国家保卫局长邓发同志，他们正在露天下站着开会。周副主席在会上说：“……是的，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万恶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无耻谣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

会后，当天夜里在龙坪镇就查出来三个坏家伙，一个个贼头贼脑，看样子就不是好东西。经过保卫部门审讯证实，他们是被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地痞和流氓，伪装成红军，专门混到我们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的。

查出了着火原因，抓到了放火者，第二天国家保卫局在龙坪镇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向群众宣传、讲解了红军的政策，彻底揭穿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当群众了解了事情的真象之后，无不义愤填膺。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就将这三个坏蛋枪毙了。同时，周副主席还责成供给部调查并且给受难的群众以适当

的救济。

从此，敌人这条放火的毒计，彻底破产了。红军战士在长征的道路上，更加提高了革命警惕性。